

兩唐書列傳部分詞彙比較研究

劉傳鴻◎著

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成果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兩唐書列傳部分詞彙比較研究

劉傳鴻◎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成果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兩《唐書》列傳部分詞彙比較研究/劉傳鴻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9. 5
ISBN 978-7-80752-358-1

I. 兩… II. 劉… III. ①新唐書—詞彙—研究②舊
唐書—詞彙—研究 IV. H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61201 號

兩《唐書》列傳部分詞彙比較研究

劉傳鴻 著

特約編輯	周 璐 劉思文
責任編輯	施 維
裝幀設計	周 明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機投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13.125
字 數	300 千字
書 號	ISBN 978-7-80752-358-1
定 價	26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董志翹

時間過得真快！三四年前的事情如同昨日。

記得是 2005 年底在杭州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的馬貝加教授對我說，新改名的溫州大學目前正在加速發展，因此急需語言文字學的高層次人才，希望我推薦一位即將畢業的優秀博士生將來到溫州大學工作。後來我便推薦了劉傳鴻。

推薦傳鴻，我是經過慎重考慮的。我想，首先要對得起馬教授對我的信任，同時要對求賢若渴、充滿活力的溫州大學負責。而傳鴻從碩士到博士都跟隨着我，我們相與論學六年，我對他是十分了解的。六年中，他勤勉善思的精神及不尚空談、嚴謹踏實的學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過大量的科研實踐，他已逐步養成了一切從語言實際出發，從共時、歷時的角度關注漢語演變發展的良好習慣，具備了漢語史研究者的敏銳眼光及較強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的碩士學位論文《〈西陽雜俎〉詞研究》被評為優秀。攻博期間，先後發表了多篇與專業密切相關的學術論文，其中有幾篇是發表在《中國語文》、《語言研究》這類國內權威語言學刊物之上，這對於一個青年學子而言，實為不易。在

第五屆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報告的論文也受到與會專家的一致好評，故在本專業同屆畢業生中，應屬佼佼者。推薦他到溫州大學工作，我可以放心。

於是，2006年的夏天，傅鴻携妻子一起到了溫州。隨後雖然常有電話、郵件聯繫，但南京與溫州遙隔千里，見面的機會委實不多。

轉眼到了2008年夏，中國語言學會13屆年會在溫州召開，傅鴻任教的溫州大學是會議的承辦單位，傅鴻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會議的參加者及會務組的工作人員。會務工作是繁忙而又瑣碎的，我雖然與會，但會議期間只見傅鴻忙碌的身影，卻未能坐下來細談。直到會議結束，我因返程機票稍晚，須在溫州等待，傅鴻這才脫出身來整整陪伴了我一天。上午，我們就在賓館的房間裏神聊，他詳細地對我講述了來到溫州大學工作後的一些情況，更多的是講溫州大學對他的培養，同仁們對他的幫助。言及自己，他始終用語甚謙。但幾天會議期間，通過與馬貝加教授的交談，通過溫州大學同仁對傅鴻的評價，我切實地感受到了傅鴻這幾年來勇猛精進的步伐，他更加成熟了，不僅是學術上，而且在為人處世上。令我由衷欣慰的是：傅鴻沒有給母校丟臉。

言談中，傅鴻告訴我，他的博士論文《兩〈唐書〉列傳部分詞匯比較研究》經過三年的反復補充修改，即將由浙江省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出版，並向我索序。我當時就允諾了。不過回寧以後，由於課務、科研以及種種瑣事纏身，一拖再拖，一直沒有落筆。直到前不久，傅鴻來郵件告知，書已經排版了。這才猛然驚醒，趕快坐下來寫幾句話：

傅鴻研究的課題是唐代史籍詞彙，唐代在漢語史上正處於中

古漢語向近代漢語的過渡時期。

本人的“十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是《20世紀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論綱》（已於2006年結題），原來打算有“20世紀國外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一章，後借昔日學生董秀芳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之便，請她收集20世紀西方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論著，經一年搜尋，竟所得甚少。也曾通過川大同仁雷漢卿教授赴韓國任教之便，請他收集20世紀韓國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論著，亦告未見。而本人曾在日本任教數年，經自己收集、回國後又托日本友人關注，但所得甚微，所有者亦均為“詞語索引”、“個別詞語考釋”、“詞典”類的成果，真正從漢語詞彙史角度研究的論著蓋寡。日本是研究漢學的大國，日本如此，遑論其他。

究其原因，國外學者研治漢語者，一是研究現代漢語者多於研究漢語史者；二是研究漢語史者，大多集中於研究語音、語法。漢語詞彙史研究，在本國而言，也是漢語史研究中相對薄弱的環節。這是因為漢語歷史悠久，詞彙面廣量大，數千年間變化多端，其中涉及社會、文化、心理等諸多因素，本國人治之，亦甚為不易，更何況是外國人。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詞彙史（特別是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史）研究逐漸引起重視，本國不少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開始投身其間，如關於正史的詞彙研究的博士論文，先後有四川大學博士生管錫華的《〈史記〉單音詞研究》（1998年），浙江大學博士生池昌海的《〈史記〉同義詞研究》（1998年），四川大學張能甫的博士後出站報告《〈舊唐書〉詞彙研究》（2002年），復旦大學博士生蘇傑的《〈三國志〉異文研究》（2001年，主要為文獻學研究，其中有關於詞彙的章節），萬久富的《〈宋書〉復音

詞研究》(2002年),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李麗的《〈魏書〉詞彙研究》等等,可以說,這些研究,各擅勝場,都為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史研究作出了貢獻。

傳鴻的研究亦屬此類,不過傳鴻的研究,自有他的明顯特色。

以往的正史詞彙研究,往往就一部正史,對其中的詞彙進行選擇性的描寫、統計、比較。而且往往是對其中某一類詞的描寫分析。如管錫華對《史記》單音詞、池昌海對《史記》同義詞,萬久富對《宋書》復音詞的研究。在方法上也往往是分類,如萬久富將《宋書》中的復音詞分為“復音新詞”、“同素異序復音詞”、“復音虛詞”幾類,然後是例證排列。張能甫將《舊唐書》的詞彙根據近代詞語、外來詞語、品評用語、熟語分類。而劉傳鴻的研究是選擇《舊唐書》、《新唐書》這兩部所記史實大致相同而語言又有較大差別的史書進行比較研究。後晉劉昫監修的《舊唐書》,200卷。記事上起唐高宗李淵武德元年(618),下迄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907)。其中記武宗以前史事,主要以唐初至代宗諸朝國史及武宗以前實錄為藍本,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後期史事則所據雜亂。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225卷。記事時限同《舊唐書》,多據《舊唐書》改作補充,比之前者,頗詳於唐後期史事。由於編撰時代、編撰人員及編撰旨趣的不同,兩書內容大體相同,而語言差異明顯,前者“言淺意陋”,而後者典雅趨古。這些都為兩書詞彙的比較研究創造了條件。劉傳鴻選擇新、舊《唐書》列傳部分的詞彙進行比較研究,以期探索不同時代、不同撰者、不同風格的史籍用詞的差異,從而揭示造成兩書詞彙差異的具體原因及探討詞彙的發展演變情況。其學

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南京大學汪維輝教授所云：“選題有新意。兩《唐書》的列傳部分所記史實大致相同，語言卻存在着較大差異，這就為比較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價值很高的語料，可以據此探討兩書詞彙（包括用字）的特點和差異、它們與唐宋口語的關係以及兩書語言的性質乃至史書作為漢語史研究的語料價值等重要課題。而這份資料及這樣的研究角度迄今無人涉及，因此本文的選題確有其獨到之處。”華東師範大學（現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華學誠教授指出：“兩《唐書》撰修時間前後雖然相差只有百餘年，但是由於編者素養、社會背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們的語言差別卻非常明顯。這些差異都有哪些具體表現，形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以往的零星研究對這些問題雖有涉及，但是既不全面、系統，更不深入，尤其是把兩《唐書》放在一個對比格局中進行討論，至今還沒有人做過。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傳鴻的博士論文具有原創意義。”

國內有些史籍詞彙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一般都是對各詞語孤立地進行描寫、排比、歸納。因此往往重於排比例證，歸納釋義及詞數的統計，這在當今電子語料庫比較齊備的情況下，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而劉傳鴻的論文自始至終貫穿了“比較”的方法，下了極大的功夫，對兩書同一語境中的對應詞語作了窮盡性的調查，並一一摘錄出來（作者命之為“詞對”，每類動輒成百上千組）。從第一至第四章，作者用了全文近一半的篇幅，以單音詞對、雙音詞對、單雙音詞對、多音節詞對及短語對應為單位，從單音詞用詞的風格（古今、僻通、文白）、多音詞語素的關係（語素全同、語素全異、語素部分相同）等方面進行了細致的比較，不僅從用字、意義、結構上，而且從出現頻率上揭示兩

書的語言特色及語言風格。論文還參照《漢語大詞典》，結合檢索電子語料庫，對新舊《唐書》中三千多個新詞（或新義）進行了描寫和考察，並運用統計方法，對新舊《唐書》中新詞、新義的分布作了比較，比如：新、舊《唐書》新詞、新義與研究詞數比例分別為78.6%、36.4%，《新唐書》新詞雖多，但單義項為主，且由生僻語素構成為多，故現漢很少繼承使用；《舊唐書》新詞雖少，但以多義詞為主，且由通用語素構成為多，故大多現漢中仍在使用的，表現出較強生命力。這些發現對大型語文工具書的編纂，漢語詞彙史研究均有極大參考價值。論文不但通過比較，揭示了兩書的語言特色和風格，難能可貴的是，還能從兩書編修的客觀背景、編修者的主觀故意、文學風氣的影響方面找出形成差異的原因。論文還將兩書詞對的比較運用於詞語的考釋，所考40多個詞語，大多精當，體現了扎實的訓詁學功底。擔任傳鴻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的浙江大學張涌泉教授也對這篇論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充分運用比較方法解詞釋義，是本文的一個特色。凡所考論，作者都通過新、舊《唐書》的比較來展開，因而說服力強。……新見勝義，往往而遇。”

呂叔湘先生曾經說過：“一種事物的特點，要跟別的事物比較才顯出來。……語言也是這樣，要認識漢語的特點，就要和非漢語比較；要認識現代漢語的特點，就要跟古代漢語比較；要認識普通話的特點，就要跟方言比較。無論語音、詞彙、語法，都可以通過對比來研究。”文獻學大家張舜徽先生在史學領域，也曾大力提倡比較研究，他曾著有《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一書，指出《史記》與《漢書》，《後漢書》與《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

與《南史》、《北史》，《舊唐書》與《新唐書》等都能用來校讀。劉傳鴻在方法論上，成功地運用了呂老、張老所提倡的“比較”法。這不由使我回憶起了自己的一段學術經歷。記得三十年前（1979年秋），我跟隨南師大著名語言學家徐復教授學習古代漢語，徐先生曾讓我訂一個五年的自學計劃，五年內將《史記》與《漢書》的相關部分對讀幾遍，然後將《史記》的三家注與《漢書》的顏師古注及王先謙補注進行比較研究。當時，二十多歲的我，尚不能完全理解徐復老的深意，覺得花這麼長時間去讀這兩部書，是否值得？不過我後來還是嚴格按照先生的吩咐去做了。讀書的過程是艱苦的，除了《史》《漢》的相關內容以及重要注家的注述，還擴展到漢代相關著作，諸如《賈誼集》、《潛夫論》、《鹽鐵論》、《淮南子》等等，但當堅持下來以後，卻真正感到了獲益無窮。可以說，正是這一段讀書的經歷，使我打下了從事訓詁學及漢語史研究的基礎：一是了解了兩漢時期的語言面貌，以及正文與注解的語言的時代差異，為漢語史的研究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識；二是方法上，比較研究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惟其比較，我們才能發現差異，才能看出問題。特別是對於剛剛踏入語言研究門徑的年青人來說，則更是如此。

總之，傳鴻的這項研究難度大，工作量重（其他史書詞彙研究都是就一部書的詞彙進行，而劉傳鴻的論文其實是兩部書的詞彙比較研究，且《新唐書》、《舊唐書》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都是較大的，中華本《史記》共10冊，《宋書》8冊。而《新唐書》20冊，《舊唐書》16冊，總計36冊），但傳鴻具備了較為扎實的漢語史、文獻學、訓詁學基本知識，又掌握了“比較”及詞語考釋的方法，加之學風嚴謹踏實，所以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在答辯

過程中，傳鴻也顯示了較為廣闊的知識面和思辨能力，所以當時就被評為當年本學科唯一的優秀博士論文。2006年又以全票獲得南師大學位委員會通過，作為校級優秀博士論文，同年又獲得了江蘇省優秀博士論文獎。

當然從更高標準看，這一研究還存在著一些不足。雖經反復修改，但書稿的某些分類和個別概念還可進一步斟酌。比如第一章下位並列的“古今”、“僻通”、“文白”以及“新舊”義概念上有交叉糾纏。有些詞義考證意義不大，缺乏深度，還可進一步揀選。個別詞條的討論，未能介紹和引述相關已有的研究成果等。

不過，我想，這是傳鴻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存在一些不足，在所難免。傳鴻富於春秋，今后的學術道路還很長，憑著他對學術的執著追求精神和踏實嚴謹的治學態度，依靠溫州大學良好的學術研究平臺，必將會在漢語史研究領域不斷進步，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我充滿信心地等待著！

董志翹

己丑年夏日於金陵石頭城下

目 錄

緒 論	(1)
一、兩《唐書》的編修	(1)
二、本課題的選題緣由、研究對象	(5)
三、本課題的研究目標及意義	(7)
四、本課題的研究現狀	(10)
五、本課題的研究方法與手段	(13)
六、文章總體結構	(14)
第一章 單音詞對比較研究	(16)
第一節 古今關係詞對比較	(18)
第二節 僻通關係詞對比較	(23)
第三節 文白關係詞對比較	(49)
第四節 新舊義關係詞對比較	(53)
第五節 詞對用字考察	(59)
第二章 雙音詞對比較研究	(66)
第一節 語素全同詞對比較	(67)
第二節 語素全異詞對比較	(77)

第三節 語素部分相同詞對比較	(86)
第三章 單、雙音詞對比較研究	(117)
第一節 《新書》單音《舊書》雙音詞對比較	(117)
第二節 《新書》雙音《舊書》單音詞對比較	(139)
第四章 其他對應比較研究	(152)
第一節 包含三音詞的詞對比較	(153)
第二節 四音詞對比較	(164)
第三節 雙音詞與三音及以上自由短語對應比較	(175)
第五章 新詞新義比較研究	(192)
第一節 《新書》新詞新義概貌	(194)
第二節 《舊書》新詞新義概貌	(229)
第三節 新詞新義比較分析	(250)
第四節 由新詞新義及其他比較看二書的語料	(262)
第六章 兩《唐書》比較釋詞	(271)
結 語	(326)
 兩《唐書》列傳部分對應用字比較研究	(328)
第一節 假借關係字對考察	(331)
第二節 異體關係字對考察	(353)
第三節 後起分化關係字對考察	(372)
第四節 同詞棄義漢字異字考察	(391)
主要參考文獻	(401)
后 記	(408)

緒 論

一、兩《唐書》的編修

《舊唐書》（以下簡稱《舊書》）編修於五代後晉天福六年（公元 941 年），參編者有史官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爲先等，後又增加了呂琦、尹拙，由當時的宰相趙瑩監修。至四年之後的開運二年（公元 945 年）六月編修成書。由於趙瑩已出任外官，遂由時任宰相劉昫領銜奏上，實際上劉昫既未參與編修，亦未作監修綜理之事。

《新唐書》（以下簡稱《新書》）的編修則相對曲折。宋仁宗慶曆年間，在宰相賈昌朝創議下，於五年（公元 1045）五月正式開設史局，但數人參修，均無所成。只有宋祁於天聖晚年（約公元 1032 年）著手，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編成列傳 150 卷。仁宗至和元年（公元 1055 年），又以歐陽修爲刊修官，修撰本紀、志、表等部分。至仁宗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全書告成，由監修官曾公亮具表奏上。參修者有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等，由於主要成於歐陽修、宋祁之手，因此分題二人

之名。對《新書》與《舊書》的編修情況，史學研究者考證較多^①，本書不打算贅述。以下我們對二書編修情況作一比較說明。

1. 二書編修歷史背景不同

《舊書》編修於離唐不遠而戰亂頻仍的五代後晉時期，而《新書》則編修於社會穩定、文化繁榮的北宋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對二書的編修影響很大。

由於社會動亂，《舊書》在收集史料方面困難重重，很多史料一時難以獲得；而編修於社會穩定時期的《新書》，在這方面明顯要優於《舊書》，它不僅有《舊書》作為參照，而且此時新的唐代史料大量出現^②。直接表現就是：《舊書》前密後疏，而《新書》則補充了大量《舊書》疏略的部分。具體到列傳，《新書》不僅增加了很多《舊書》未有的人物列傳，而且對《舊書》記述較簡的列傳亦增加了很多內容。

由於社會動亂，《舊書》編修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必然難以得到保證，這自然會影響對所獲史料的加工整理；相對來說，《新書》的編修則具有極大優勢。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舊書》多照錄唐時《國史》、《實錄》，而《新書》則經過修史者細致深入加工的現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由於社會動亂，後晉時代的統治階級對歷史事件的看法與社會穩定時期的北宋統治階級也會不同，表現在二書當中，就是編修者對一些歷史事件的態度、評價有所不同。

① 關於編修情況參黃永年《〈舊唐書〉與〈新唐書〉》、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李一飛《〈新唐書〉的編撰及參撰人紀考》。

② 這也是重修《新書》的原因之一。

社會動亂是《舊書》編修的不利條件，不過《舊書》編修也有有利的一面：它成書於唐亡之後僅三十餘年的後晉，編修者多為唐時舊人，對唐末的歷史事件多有親身經歷，因此所述事件真實可信；而《新書》編修者則缺少這個條件，雖然他們所依據的史料比《舊書》要多，但其中多有不甚可靠的野史逸聞，編修時難免會有取捨不當的問題，因此所增內容的可靠性也會打些折扣。

2. 二書編修所用時間相差甚遠

《舊書》在社會動亂的大環境下，僅四年時間即編修成書，而《新書》與之相比則長得多，僅列傳部分即達二十餘年。如此大的時間差距，對二書的編修影響巨大。可以想象，在動亂的環境下，僅四年的時間，要想對收集的史料進行細致加工，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也難怪《舊書》多照錄唐時《國史》、《實錄》了；而《新書》則有充裕的時間細致加工。因此《新書》與《舊書》相比，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結構上，都更加完備科學，語言加工亦較深入。

3. 二書編修者文學水平不同

《舊書》的編修者在文學史上默默無聞，而《新書》的編修者歐陽修、宋祁均為文學巨匠。編修者文學水平的不同，對二書亦產生了深刻影響。由於文學素養的限制，面對所收集的史料，《舊書》的編修者在謀篇布局、語言運用上，難有作為，因此書中常見重複拖沓、編排無序的現象。相對來說，歐、宋二人，同為宋代文學名家，同倡古文運動，講究行文文采，因而無論是結構安排，還是內容處理均有獨到之處。而表現特別突出的就是語言，他們力求用最簡潔的文字表達最豐富的内容。正如《進〈唐

書》表》（此《表》附於《新唐書》）所言：“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①

4. 二書編修指導思想不同

《新書》、《舊書》均記載唐代史實，為什麼有了《舊書》還要重修《新書》呢？《進〈唐書〉表》中的一些話給了我們答案：

“（《舊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僞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

“（《新書》）發揮幽沫，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事之傳。”“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舊書》的編修是傳統的延續：一個朝代滅亡，後朝一般要為前朝修史，以為本朝之借鑒。而《新書》的編修則不同，從《進〈唐書〉表》可以看出，之所以重修《新書》，主要由於《舊書》存在以下幾個明顯缺陷：1. 編次混亂，記述事件詳略不當；2. 史料缺乏，記述事實零落；3. 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態度不够鮮明，不能起到“垂勸戒，示久遠”的作用；4. 語言缺少文采，言淺意陋。彌補《舊書》的四個缺陷正是《新書》編修的指導思想。他們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1. 重新編次史料，突出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使之詳略得當。具體到列傳部分，《新書》在編修時，對人物重新分類整理，刪繁去冗。因此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新書》列傳有很多在編次及詳略上均與《舊書》不

^①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新書》明顯要優於《舊書》，但就史書的評價標準來說，這也是《新書》的一個缺陷：由於過分注重文采，講究行文的簡潔，《新書》多有記述史實不明之處；相對來說，《舊書》記述史實則詳細具體。